研究综述

2022年清史研究综述

徐　冉

2022 年的清史研究保持着蓬勃的发展态势，成果丰硕。我们充分利用各类期刊数据库和已发行期刊，并搜集同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初步建立了一个反映这一年清史研究全貌的数据库，收录论文 1132 篇，其中政治史 196 篇，边疆史 92 篇，经济史 158 篇，思想文化史 392 篇，理论与方法 99 篇，社会史 106 篇，人与自然关系史 89 篇；专著 86 部。①

整体来看，本年度清史研究各专题均有充分讨论，其中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热度不减，产出了相当数量的成果；社会史、边疆史研究也是重头戏；环境、灾荒、疫病等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则新作迭出。就专题而论，政治史中，有清一代行政和法律制度的研究最为丰富，其次是对外交政策的探讨，而对军事以及晚清以来革命与改良、政争与政党的讨论也不少。经济史中，贸易、市场与商帮的成果数量最多，传统的财政制度研究次之，土地制度与产权交易、货币金融以及近代工业发展也备受关注。思想文化领域中，传统学术与思想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其次为文献研究，而诸如文化交流、文化政策、文化教育、文化传播、宗教信仰的研究亦不少，技术史也得到一定的关注。边疆史领域，以西南和青藏地区的成果最为丰硕，北方地区次之，东南边疆则相对较少。社会史研究中，近半数为区域史研究，而有关边缘群体、城市与生活史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也有不少关于水利史和性别史的文章。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最多，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紧随其后，灾荒与疾病研究成果数量相当。此外，本年度的成果虽然大多偏向实证，也有不少学者从宏观的议题选择，理论的反思、总结与重新阐释，以及清史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对清史研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以下分述之。

一、政治史

（一）行政制度

学者们对有清一代的职官制度与政治机构做了更为精细的考察。赵轶峰考察了清代皇太子制度的更迭。② 何永智对清代户部军需房改称、机构性质、裁撤以及职能演变、运行等方面的问

[收稿日期] 2023−10−24

[作者简介] 徐冉（1997—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xr0709@ruc.edu.cn

① 对此数据库需要作几点说明。首先，本数据库期刊检索的方式主要利用的是中国知网、超星读秀知识库、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等数据库，收录标准依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21—2022）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目录（2017 年修订施行）》。为确保相关研究收录的完整性，在检索过程中文章标题未直接说明研究时段为“清代”时（如仅说明“古代”“近代”“近代以来”），凡正文研究内容与清代高度相关者也予以收录。

② 赵轶峰：《清皇太子制度拾遗》，《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题进行了考证。[1] 谢乐对清代知县改教制度作了历时性的梳理。[2] 胡存璐考察了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的演变过程。[3] 阚红柳梳理了康熙时期园居理政的历史变迁及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认为康熙朝是宫苑二元理政格局正式确立的关键时期。[4] 付永杰探讨了清前期地方官病假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对两广地区烟瘴缺制度的演变进行了梳理。[5] 张鑫敏在清代人丁编审制度的研究上有了新的推进。[6] 刘文华尤为关注晚清的政治制度与机构职能的变迁，考察了垂帘听政时期军机处职权的变化及其对光绪朝中后期乃至宣统年间政局的影响，并对清末新政导致的奏折制度快速变革进行了探讨。[7] 杜佩红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地方官本籍回避制度被打破后各地普遍出现的本省为官的现象。[8] 薛勤、康文林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统计，指出清代官员群体构成与迁转秩序具有稳定性，而清末官制改革并没有使清廷走出制度困境。[9]

学界对八旗制度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刘巳齐考察了八旗在清入关前的各种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商业性。[10] 德格吉日呼、刘小萌对乾隆朝移垦旗人中遣犯的迁移、特征以及清廷遣犯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1] 王秀峰对康熙朝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的机构设置及兵丁结构的变化做了细致梳理。[12] 吴元丰探讨了清代伊犁索伦营的设置背景、兵丁来源、建制沿革、生计维系与驻防任务。[13] 刘盈重点讨论了雍正朝时期八旗官学的完善与发展。[14] 张春阳对清代八旗佐领印轴的制作颁发过程及其格式与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并指出了满文印轴的翻译错误。[15] 刘国超考察了清代盛京掌关防佐领的设置与职掌问题。[16]

海疆是本年度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在 2022 年第 2 期组织了一组笔谈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海洋政策与海权问题。其中，陈博翼探讨了清朝的海疆政策及其与东南亚安南、噶喇吧和吕宋三个地区的联系互动。[17] 王日根则对清代前期的海疆政策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其中体现了从自我海疆意识到西方海权观的转变。[18] 胡泰山考察了康雍乾时期的海岛治理政策。[19] 吴四伍指出重粤轻闽是清朝后期海洋治理的重要特征。[20] 王泉伟则对清代沿海诸厅的设立

---

① 何永智：《清代户部军需房续考》,《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② 谢乐：《清代知县改教述论》,《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③ 胡存璐：《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研究》,《史学月刊》2022 年第 8 期。

④ 阚红柳：《康熙朝北京"一宫多苑"格局的确立与皇权政治》,《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⑤ 付永杰：《杜规避、留人才、展体恤：清前期地方官病假制度探析》,《浙江学刊》2022 年第 3 期；付永杰：《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⑥ 张鑫敏：《五年编审与逐年奏销：清代江西人丁数字的史源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张鑫敏：《乾隆朝民数汇报的制度设计及运行》,《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⑦ 刘文华：《"旧制"与"现章"：垂帘听政时的军机处职权》,《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刘文华：《清末新政与奏折制度变迁》,《安徽史学》2022 年第 2 期。

⑧ 杜佩红：《"革命"是否"革官"？辛亥革命前后的县官人事变动》,《史学月刊》2022 年第 5 期。

⑨ 薛勤、康文林：《清季改革视阈下吏部官员群体的人事递嬗与结构变迁（1898—1911）——以〈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⑩ 刘巳齐：《清入关前八旗组织的商业性——以皇太极时期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⑪ 德格吉日呼、刘小萌：《乾隆朝京旗移垦中的旗籍遣犯》,《历史档案》2022 年第 1 期。

⑫ 王秀峰：《康熙朝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沿革考》,《历史档案》2022 年第 1 期。

⑬ 吴元丰：《清代伊犁索伦营述要》,《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⑭ 刘盈：《雍正帝整顿八旗官学与满汉文化之调和》,《历史档案》2022 年第 2 期。

⑮ 张春阳：《清代八旗佐领印轴考论——兼谈印轴称谓问题和清代的"执照"》,《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⑯ 刘国超：《清代盛京掌关防佐领考》,《历史档案》2022 年第 3 期。

⑰ 陈博翼：《清代海疆执法与东南亚互动——从觉罗满保的密折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 年第 2 期。

⑱ 王日根：《重审海权观与清代前期海疆政策》,《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 年第 2 期。

⑲ 胡泰山：《康雍乾时期的海岛治策——内附治岛的两种方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⑳ 吴四伍：《清代海洋治理的地域文化与协调机制》,《河北学刊》2022 年第 1 期。

与职掌问题做了探讨。[①] 另外，新出版的《清代海洋活动编年丛书》对清代海洋史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②]

传统的河政、盐政、粮政研究也有推进。清代河政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清代大运河的治理投入了较多关注。赵珍考察了清代北运河的漕运应对与河道治理问题，[③] 倪玉平认为清代是大运河管理体系的集大成时期。[④] 田一平聚焦于雍正朝大运河治理及其中的机构协作，肯定了运河治理对维护清朝统治的积极作用。[⑤] 裴丹青通过研究嘉道年间河款到工率与融销率，探讨了清朝难以根除河工腐败的制度困境。[⑥] 苏绕绕、潘威利用空间分析、可视化等方法重建了晚清民国时段新疆的地表各灌溉指标，探讨了新疆水利近代化问题。[⑦] 盐政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认可清代盐业管理体制具有灵活性。[⑧] 有清一代的粮食制度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其中涉及禁酒政策、粮食调控等问题。[⑨]

（二）科举制度

丁修真考察了清代科举制度的运作成本，并对清代“科场之款”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意义做了评价。[⑩]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认为清代中期地方宾兴组织的大量出现源于国家因财政亏空而引发的治理成本转嫁。[⑪] 曾志平考察了清代官府对乡闱士子的饮食供给问题。[⑫] 梁志平指出为保证学额分配的平均，清代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⑬] 王学深关注到清前期的科场罢考问题与朝廷对基层管控程度密切相关。[⑭] 顾建娣探讨了江南贡院在咸同年间的遭际，指出贡院的发展体现了太平天国战争对传统科举文化的影响。[⑮] 张仲民考察了清末科举废除后举荐孝廉方正制度的运作及其影响。[⑯] 张瑞龙重新考订了 19 世纪中国举人人数，修正了张仲礼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中的估算。[⑰] 王月、张振国考察了清代大挑一等举人的授官机制及其影响力。[⑱]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会试文献集成》以及《张文达藏稀见清代科举文献汇编》这两套资料的出版为清代人物与科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

① 王泉伟：《清代沿海诸厅与海疆管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 王颖主编：《清代海洋活动编年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③ 赵珍：《清代北运河的漕运应对与河道治理》，《北京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0 期。

④ 倪玉平：《大运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北京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0 期。

⑤ 田一平：《雍正朝大运河治理及机构协作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⑥ 裴丹青：《嘉道年间河款到工率探析》，《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⑦ 苏绕绕、潘威：《清末民国新疆农田水利建设成果可视化及分析（1909—1935)》，《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⑧ 吕小琴：《“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李小庆、陆玉芹：《清乾隆朝“老少盐”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李幸：《官垄余盐：清代两浙帑盐制的运作与地方盐务经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⑨ 王正华、仲伟民：《清代禁酒演变与酿酒发展——兼论 17—19 世纪中英禁酒的异同》，《学术界》2022 年第 3 期；崔思朋、仲伟民：《清代禁酒与粮食问题》，《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李尔岑：《“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清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谢祺：《清代海禁与东南沿海地方粮食调控的博弈》，《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2 期。

⑩ 丁修真：《清代“科场之款”的嬗变》，《历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⑪ 丁修真：《宾兴何为：清代中期的科举、国家与地方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⑫ 曾志平：《清代官府对乡闱士子的饮食供给》，《历史档案》2022 年第 1 期。

⑬ 梁志平：《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⑭ 王学深：《清前期基层管控视域下的科场罢考案与律法适用》，《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⑮ 顾建娣：《咸同年间的江南贡院》，《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⑯ 张仲民：《名亡实存的科举：清末的孝廉方正举荐及其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⑰ 张瑞龙：《19 世纪中国举人人数考论——〈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补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⑱ 王月、张振国：《清代大挑一等举人的授官机制》，《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史料。[①]

（三）法律与法制

不少学者针对清代的刑法制度与刑罚方式流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茆巍通过考察清代的洗冤检验文本，认为清代有关蛊毒的法律更多地具有宣示意义。[②] 而在其新著《洗冤：清代命案检验取证研究》中，他考察了清代法医检验技术与制度。[③] 郑小悠的专著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演变做了详细梳理。[④] 姜翰考察了清代锁带杆墩之法的源流，认为其推动了以监禁为核心的刑罚模式的形成，预示了刑罚变迁的方向。[⑤] 李明、张如星探讨了清代刑部如何通过立法、修订例文等方式治理顶凶这一类疑难案件。[⑥] 李欣荣重点关注晚清的刑制改革与监狱制度转型，对晚清笞杖改罚金的刑制改革过程与以直隶习艺所为代表的狱制改良进行了探讨。[⑦] 郭文忠、祖浩展估算了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的人数。[⑧]

清代地方司法实践亦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有多部专著出版。其中，尤陈俊探讨了清代"健讼之风"话语建构的表达性现实的特点，以及清代官方应对"健讼之风"的方式与效果。[⑨] 他还另文探讨了州县官实际任期对明清地方衙门理讼能力的影响。[⑩] 吴景杰通过对《大清律例根原》按语与相关档案的研究，认为清代中央掌握着实际立法权力。[⑪] 邓建鹏指出清中后期以降，地方衙门司法实践与制度之间的偏离趋势愈发明显。[⑫] 其对《清史稿・循吏传》的研究则表明清代地方司法滞狱重重、违法裁决的现象屡见不鲜。[⑬] 杨松涛通过比较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的诉讼率，指出不同的地方权力结构导致司法制度资源配置的差异。[⑭] 张小也考察了清代坟山争讼的纠纷问题，认为其中呈现了中国传统法理的形成过程。[⑮] 在法制史研究理论层面，胡祥雨指出在清代法史研究中应警惕法律多元论的局限，并重视法律中心论在清朝法史研究中的作用。[⑯]

（四）革命与改良、政争与政党

有关晚清政局与革命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厚。经盛鸿探讨了清末江苏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⑰] 崔志海利用美国驻华使馆档案考察了 1907 年发生在武汉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⑱] 李皓考察了辛亥革命中东三省奉天保安会这一临时机构从革命机关到最终的反"革

---

① 龚延明主编：《清代会试文献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 年；陈维昭、张文达主编：《张文达藏稀见清代科举文献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② 茆巍：《消失的"黑巫术"？清代司法中之蛊毒案件探究——基于洗冤录文本的考察与展开》，《安徽史学》2022 年第 1 期。

③ 茆巍：《洗冤：清代命案检验取证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 年。

④ 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

⑤ 姜翰：《从非刑到常法：清代锁带杆墩源流考》，《史学月刊》2022 年第 4 期。

⑥ 李明、张如星：《清代刑部对顶凶问题的治理》，《安徽史学》2022 年第 1 期。

⑦ 李欣荣：《清季笞杖改罚金的刑制改革及其困境》，《史林》2022 年第 5 期；李欣荣：《直隶经验：清季习艺所形态下的狱制转型》，《安徽史学》2022 年第 2 期。

⑧ 郭文忠、祖浩展：《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⑨ 尤陈俊：《聚讼风云：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⑩ 尤陈俊：《官不久任与健讼之风：州县官实际任期对明清地方衙门理讼能力的影响》，《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⑪ 吴景杰：《清代中央与地方立法的协商：以"窃盗"之各省专条为例》，《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 68 期（2022 年）。

⑫ 邓建鹏：《清代州县司法实践对制度的偏离》，《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⑬ 邓建鹏：《清代循吏司法与地方司法实践的常态》，《文史》2022 年第 3 期。

⑭ 杨松涛：《司法制度资源与地方诉讼案件的形成——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的比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⑮ 张小也：《法律与社会变迁：清代坟山争讼的历史考察》，《南国学术》2022 年第 2 期。

⑯ 胡祥雨：《清朝法史研究中的多元论及其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⑰ 经盛鸿：《江苏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安徽史学》2022 年第 1 期。

⑱ 崔志海：《美国驻华使馆档案中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广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命”工具的演变。[①] 叶舟对浙江旅沪学会在清末民初间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考察。[②]

不少学者对晚清乃至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以及其中的关键人物进行了研究。彭剑主张跳出“内”“外”框架来探讨晚清权力结构的问题，认为预备立宪期间，权力结构呈现向三权鼎立方向发展的新变化。[③] 陈玉兰通过细致的考订，证实了王韬确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④] 茅海建对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康有为加入弭兵会的经过进行了梳理，揭示了翁同龢在康有为步入高层政坛、主导戊戌变法中的作用。[⑤] 郑大华探讨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⑥] 周志永探讨了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士绅谭延闿的角色转换与心路历程。[⑦] 邓华莹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后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指出当时中国已经进入探索民权政治的新阶段。[⑧] 潘崇对宣统二年（1910）疆臣对干路借款计划的集体性讨论做了细致的梳理，认为疆臣的会、阁讨论是近代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例之一。[⑨] 李莹、李玉通过比较太平军“杨萧三谕”与同盟会《讨满洲檄》的区别与联系，探讨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⑩] 此外，本年修订出版的《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修订版）》是研究晚清资政院的重要史料。[⑪]

政党与政争方面，唐论梳理了岑春煊丁未“假照片事件”的经过，指出这一事件是袁世凯、端方等人在政争中打击政敌的手段。[⑫] 顾建娣考察了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与曾国藩在派淮扬水师赴援临淮以助湘军一事上的分歧。[⑬] 吴仰湘利用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重新梳理了《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之始末。[⑭] 朱家英等对袁昶、许景澄“庚子上疏”中“三疏”的文本真实性、事件的生成过程做了细致的考察。[⑮]

（五）外交

清前中期的外交关系史研究主要围绕来华使团与清廷的交涉以及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展开。[⑯] 而晚清外交关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张艳国、徐为结考察了庐山牯岭英国租借地的形成与收回过程。[⑰] 王士皓通过探讨清政府在古巴独立后的外交应对，指出其中反映出晚清外交近代化转型的程度。[⑱] 马维熙重新探讨了庚子赔款中因还金还银的具体偿付问题而起的争执与解决途径。[⑲] 黄运考察了吗啡进口管制政策制定的曲折谈判过程，指出其背后所体现的清政府在不平等权力格局下的外

---

① 李皓：《辛亥革命中的奉天保安会 : 从革命机关到反“革命”工具》，《历史档案》2022 年第 3 期。

② 叶舟：《同乡组织与政治活动：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旅沪学会为中心》，《史林》2022 年第 2 期。

③ 彭剑：《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清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④ 陈玉兰：《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实》，《历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⑤ 茅海建：《康有为与“弭兵会”——兼论翁同龢荐康有为说》，《清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⑥ 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民族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⑦ 周志永：《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谘议局》，《史学月刊》2022 年第 12 期。

⑧ 邓华莹：《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2 年第 6 期。

⑨ 潘崇：《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⑩ 李莹、李玉：《语言文字与革命动员：“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⑪ 李启成校注：《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22 年。

⑫ 唐论：《计中计：丁未“假照片事件”探析》，《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⑬ 顾建娣：《拒援临淮：同治二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略分歧》，《安徽史学》2022 年第 4 期。

⑭ 吴仰湘：《〈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⑮ 朱家英：《袁昶、许景澄“庚子三疏”问题再检讨》，《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朱家英、卢仙娥：《袁昶、许景澄“庚子上疏”事件的生成史考察》，《安徽史学》2022 年第 5 期。

⑯ 陈玉芳：《重新解读清中前期欧洲来华使团与外交礼仪之争》，《史学集刊》2022 年第 6 期；施晔：《新见马戛尔尼使团档案及相关问题考析》，《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⑰ 张艳国、徐为结：《庐山牯岭英国租借地的形成与收回述论 (1894—1936)》，《江西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

⑱ 王士皓：《清政府在古巴独立后的外交应对》，《历史档案》2022 年第 4 期。

⑲ 马维熙：《还金还银？庚子赔款偿付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交挣扎。① 崔志海通过对清末中美关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争的考察指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政府已经具有收回国家主权与利权的意识。② 徐炳三通过重新考订义和团运动期间盛京将军增祺擅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这一事件，揭示了晚清官场政治的复杂性与义和团运动时期清廷对俄交涉的艰难。③ 云妍对开平煤矿案中中外各方的行动与交涉做了细致的考订与还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主流叙事框架的开平矿案图景。④ 章永乐指出 1900 年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对"门罗主义"的呼吁影响了美国论者对"门罗主义"的再定位，在美国"门罗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⑤

二、经济史

（一）财政制度及其运作

有关清代财政制度的讨论中，陈锋探讨了清代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的关系。⑥ 毕学进等人讨论了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的进程与特点，指出集权下的分权有利于实现财权事权的合理分配。⑦ 任智勇探讨了清代自咸同时期以来商业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的过程，指出财税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⑧ 魏文享所著《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讨论了晚清的财政转型与所得税立法情况。⑨ 他和张莉也关注了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财政、货币逻辑。⑩

关于清代地方财政制度，学者们较多地讨论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困境与变革。刘文鹏、屈成对明清时期驿站财政制度的困境与改革做了详细的梳理，认为清代"原额主义"下僵化的财政体制是驿站财政运转维艰的重要原因。⑪ 胡雁通过对光绪中期户部实行的州县钱粮交代改革的探讨，指出当时清廷的制度更新能力无法满足治理亏空的需求。⑫ 肖高华考察了财政监督制度的近代转型。⑬ 刘雅媛以清末民初上海县城为例，考察了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与收支结构。⑭

赋税征收与调配问题依旧是清代财政史研究中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田赋、厘金、公债和关税等方面。陈仁鹏认为清代田赋征收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多有异化，形成了诸多非正式制度，这与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以及该逻辑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⑮ 杨国安指出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赋役征收主要是以县衙中的户书、粮书等户房书吏以及乡里社会中的里书、册书等差役人员为主。⑯ 吴滔讨论了清代上纳布匹定价机制的发展过程，认为上纳布匹的价格蕴含着传统国家通过市场实现贡赋征集的机制。⑰ 刘文远通过考察清代河工加价摊征的情况，指出清代

---

① 黄运：《由禁政而外交：清季吗啡进口管制政策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② 崔志海：《清末中美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之争》，《社会科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③ 徐炳三：《增祺擅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问题新探》，《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④ 云妍：《晚清开平矿案的生成》，《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⑤ 章永乐：《移樽施教：伍廷芳与 20 世纪初美国"门罗主义"的再定位》，《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1 期。
⑥ 陈锋：《财政与国家治理：清代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更张》，《史学集刊》2022 年第 5 期。
⑦ 毕学进、马金华、许晖：《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框架与当代启示》，《学术研究》2022 年第 12 期。
⑧ 任智勇：《晚清财税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1 期。
⑨ 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⑩ 魏文享、张莉：《"钞票之税"：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财政、货币逻辑》，《史学月刊》2022 年第 1 期。
⑪ 刘文鹏、屈成：《明清之际驿站财政制度的变革》，《山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0 期。
⑫ 胡雁：《光绪中期的地方钱粮亏空治理——以州县钱粮交代改革为中心》，《青海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⑬ 肖高华：《"以内治外"——央地博弈下的近代地方财政监督制度设计》，《史学月刊》2022 年第 1 期。
⑭ 刘雅媛：《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的形成与构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⑮ 陈仁鹏：《表达与实践：清代田赋征收制度的嬗变及困境》，《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⑯ 杨国安：《书差、税收与秩序：明清两湖乡村赋役征收群体考察》，《河北学刊》2022 年第 3 期。
⑰ 吴滔：《清代上纳布匹定价机制初探》，《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财政的重要症结在于无法为加赋找到正当化的途径。①

厘金、公债与海关是晚清政府筹集财政资源的重要手段，依然为学者们所关注。有关晚清厘金制度的影响，学者们观点各异。颜色、雍前质疑了视厘金制度为恶税的传统观点，揭示了厘金对商贸和经济发展的复杂作用。② 蔡杨、杨兰采用双重差分法量化考察了晚清厘金对粮食市场整合的影响，认为厘金征收既不利于相邻府间的市场整合水平，也损害了长距离贸易和市场整合水平。③ 盛海生、周晓光考察了近代皖南的茶捐茶厘，认为茶税厘革举措为缓解军需之虞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也导致华洋茶商勾结。④ 在晚清的公债问题上，刘杰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公债问题投入了较多关注，不仅探讨了现代“公债”概念在晚清时期形成与演进的过程，也对晚清民国时期国家财政制度转型过程中“爱国公债”的发行与偿还情况做了考察。⑤ 倪玉平对清朝咸同时期政府借债的曲折过程做了详细的梳理。⑥ 蔡诚、张志云分析了晚清海关税则的沿袭与改变，指出晚清确立的“值百抽五”的税则是中国近代发生关税自主运动的根本原因。⑦

捐纳与捐输亦是清代财政资源汲取的重要手段。江晓成、陈惠云考察了清前中期盐商捐输的运作过程，指出乾隆朝是清代盐商捐输动机与性质转变的关键时期，而嘉庆朝盐商捐输的强制性达到极致。⑧ 何永智指出嘉道外捐反映出清代国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也体现了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角力。⑨ 黄凯凯认为清代两淮盐商捐输对国家财政补给无益。⑩ 张秀丽指出晚清的戏捐是清末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⑪

漕运与协饷是清代财政调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晏爱红考察了清代咸同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的过程与成效。⑫ 康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梳理了乾嘉时期漕运实际运作中的诸多细节。⑬ 廖文辉考察了咸同之际新疆地区的协饷供应危机及各方应对策略。⑭ 彭建、童巍雄考察了清初云南的协饷情况，指出清初滇饷协济奠定了此后清朝治理西南边疆“本省筹措加外省协拨”的财政格局。⑮

（二）土地制度与产权交易

土地制度一直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胡英泽通过对山西省文倚村所保存的清代康熙、道光、同治、光绪四个不同朝代的鱼鳞册的研究，指出文倚村大小户、新旧户的土地交易限制了地权分配的过度集中与分散。⑯ 王正华对清代乡村土地交易中“典”与“活卖”在百姓与官方认知上的差异进行了探讨。⑰ 姜修宪主要依据孔府庄园契约文书等史料，探讨了土地买卖

---

① 刘文远：《从河工加价摊征看清代加赋的正当化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② 颜色、雍前：《厘金是恶税吗？来自晚清棉布市场的证据（1871—1890）》，《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③ 蔡杨、杨兰：《晚清厘金征收与市场整合——基于双重差分法的量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④ 盛海生、周晓光：《危机与应对：曾国藩与近代皖南茶税厘革考论》，《中国农史》2022 年第 3 期。
⑤ 刘杰：《现代“公债”概念的生成及其在晚清民初的流播》，《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刘杰：《辛亥鼎革与财政举债：晚清民初“爱国公债”的发行与偿还》，《史学月刊》2022 年第 11 期。
⑥ 倪玉平：《清朝咸同时期的政府借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⑦ 蔡诚、张志云：《晚清海关税则之比较研究：1843—1902 年》，《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⑧ 江晓成、陈惠云：《清前中期盐商捐输运作流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⑨ 何永智：《经费筹济与财政汲取：清嘉道两朝外省捐监究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⑩ 黄凯凯：《清代两淮盐商捐输新探》，《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⑪ 张秀丽：《“寓捐于禁”——清末演戏与戏捐开征》，《清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⑫ 晏爱红：《清咸同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述论》，《中州学刊》2022 年第 6 期。
⑬ 康健：《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⑭ 廖文辉：《咸同之际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与财政困局》，《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⑮ 彭建、童巍雄：《军国急需：清初云南协饷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⑯ 胡英泽：《山西省文倚村地权分配长期趋势研究（1713—1892）》，《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⑰ 王正华：《合与分：清代乡村土地交易中的典与活卖》，《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与自然灾害、农事周期与定期市集期的相互关系。① 王大任指出，近代东北乡村的“人情贷”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道义经济”的表现，而是商业资本借助社会人情网络向乡村扩张的方式。② 李一苇探讨了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为代表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权制度变迁。③ 胡铁球、杨贤毅利用《同治兰溪鱼鳞图册》这一史料探讨了晚清时期兰溪县土俗亩、藏等亩与国家标准亩制的关系，肯定了鱼鳞图册史料的可信度。④

清代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刘晨通过对太平天国在辖境苏浙农村推行的赋税政策的考察，指出其既违背了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又触及地主阶级利益。⑤ 李昕升探讨了清至民国时期广西的“惰农”现象，指出广西尤其是岩溶地区的经济方式呈现的是“斯密型增长”模式。⑥ 王保宁、耿雪琎对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人口压力是华北大豆扩种的根本动因提出了质疑，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对豆饼的需求量增大重塑了华北农业生产模式。⑦

随着越来越多民间文书的发现与利用，有关清代土地与房屋买卖、各类产权问题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刘诗古探讨了清代至民国城市店铺“铺底权”形态的演变问题。⑧ 马秀英、曹树基探讨了清代吐鲁番的葡萄园租卖问题，认为土地租卖体现了吐鲁番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高度融通。⑨ 刘沫寒、赖骏楠对清代四川南部县常见的田房交易“余业承买”案件做了研究，揭示了清代田房交易和纠纷中买卖双方道德话语与自利理性的复杂交织。⑩ 凌鹏考察了中国传统买卖契约中的“摘留”纠纷，认为“摘留”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契约以及契约链背后的人情关系与人际关系网。⑪ 陈月圆、龙登高探讨了清末民间公产转型问题，指出晚清政府与知识群体在国家行政能力有限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对传统民间公产的整合与重组推行现代公共事业。⑫ 杜正贞以山林川泽确权中的划界和界址问题为例，探讨了产权实践的区域史研究的必要性。⑬ 梁宏志、冉旭利用清水江文书考察了清代乡村经济交易中的“中人”报酬支付方式、支付方和酬金。⑭

（三）货币与金融

郭卫东梳理了近代中国官绅商民对外国银行在华发行钞票的抵制方式。⑮ 苏颂、张侃讨论了台湾银行以日本银圆统一中国南部货币的多种举措及其失败的原因。⑯ 刘杰对近代汉口区域银两货币市场上所通行的虚银两“洋例银”的发展、变动与消亡作了考察，认为其对近代汉口货币

---

① 姜修宪：《何为“吉日”：晚清民初孔府庄园小农土地买卖的时机选择》，《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② 王大任：《来自商人的“人情贷”——近代东北乡村商业资本对乡村基层社会网络的嵌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③ 李一苇：《近代城市化中的地权制度变迁——以上海租界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④ 胡铁球、杨贤毅：《晚清浙江清赋中的土俗亩、藏等亩与土地面积落实——以〈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⑤ 刘晨：《太平天国辖境苏浙农村社会经济秩序探析》，《历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⑥ 李昕升：《清至民国时期广西“惰农”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⑦ 王保宁、耿雪琎：《利从江南来：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豆类作物更替》，《中国农史》2022 年第 2 期。

⑧ 刘诗古：《从租客到铺东：清至民国城市店铺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⑨ 马秀英、曹树基：《等额还本付息：清代吐鲁番的葡萄园租卖》，《中国农史》2022 年第 3 期。

⑩ 刘沫寒、赖骏楠：《清代田房诉讼中的道德话语与自利理性——以四川南部县“余业承买”案件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⑪ 凌鹏：《契约与人情——以中国传统买卖契约中的“摘留”纠纷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⑫ 陈月圆、龙登高：《整合与承继：清末民间公产转型与新式教育体系的建构》，《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⑬ 杜正贞：《中国传统产权实践中的“界”——区域史视野下的山林川泽产权研究》，《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⑭ 梁宏志、冉旭：《清代乡村经济交易中的“中人”报酬研究——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⑮ 郭卫东：《货币战争：近代中国对外国在华发行钞票的抵制》，《史学集刊》2022 年第 1 期。

⑯ 苏颂、张侃：《近代台湾银行在中国南部的银圆扩散与通货统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市场及商贸市场的发展变迁有较大影响。[①] 韩祥探讨了甲午战争后全国性钱荒危机形成的原因、官方应对举措及其对城乡商业与货币流通结构的冲击，认为其是清末货币金融改革的序幕。[②] 燕红忠、谢萍萍考察了传统金融市场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的长期影响。[③] 张宁指出在北方和东南沿海个别城市流通的民间钱票是清中叶本土金融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郑成林、钟钦武考察了晚清中央银行体系的构建与运行。[⑤] 朱海城对晚清民国时期华商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实践、运行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⑥] 潘晓霞探讨了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酝酿、形成与发生机制。[⑦]

（四）贸易、市场与商帮

清代贸易、市场与商帮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特点，诸如丝织、糖、林木、毛皮、麝香、造酒、药材、造砖、水产等行业都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⑧] 而在探讨这些看似零碎行业贸易时，学者们关注到了贸易背后所涉及的中外博弈、传统经济的近代转型、由商业推动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如叶磊聚焦于日俄战争后日本成立的鸭绿江采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性质，指出日本对鸭绿江林业的殖民介入程度非常有限，而本土的、由经济规律自发孕育的料栈更具有生命力。[⑨] 李亚揭示了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桐油贸易对区域社会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⑩] 崔继来通过对明清时期江西造砖业的梳理，指出从供砖到商品砖的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走向。[⑪]

有关清代茶叶贸易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章毅、黄一彪探讨了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也对徽州茶商伙计的经营方式进行了考察。[⑫] 朱英、钟元泽讨论了晚清旅汉粤商在汉口茶叶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其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⑬] 江泰新、苏金玉总结性地对明清时期商品与市场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⑭] 倪玉平指出，清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发生了由内地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⑮] 余康指出清代两淮盐务中的引窝资本市场具备资本积累与资金融通的功能，体现了市场机制对清代盐务的重要性。[⑯]

清代的国际市场与对外贸易研究也得到推进。王振忠利用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探讨了 18 世纪的中日贸易实态。[⑰] 熊昌锟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为中心讨论了华洋商事

---

① 刘杰：《近代汉口区域银两货币市场的演变——以“洋例银”运行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② 韩祥：《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城乡社会的冲击》，《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③ 燕红忠、谢萍萍：《冲击与延续：传统金融市场对新式银行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④ 张宁：《从钱票流通看清中叶的金融变革——兼论金融史研究的本土视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⑤ 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史学月刊》2022 年第 3 期。

⑥ 朱海城：《近代华商股票市场制度与实践：1872—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⑦ 潘晓霞：《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与日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⑧ 相关系列研究可参见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唐咸明：《晚清民国时期郁江流域蔗糖运销网络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学术论坛》2022 年第 2 期；马伟、佟淑玲：《中间商・商路・市场体系：近代中国内陆腹地羊毛、毛皮输出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王海兵：《市场、商号与口岸：近代青藏高原东缘麝香的贸易流通》，《思想战线》2022 年第 1 期；高福美：《清代京城私酒考论》，《历史档案》2022 年第 3 期；王卫平、冯燕：《近代阳澄湖蟹业经济兴盛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2022 年第 4 期；刘秋根、刘新龙：《晚清民国时期旅粤山西药号经营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7 期。

⑨ 叶磊：《鸭绿江采木公司与日本对东北林业生产的殖民介入 (1908—1931)》，《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⑩ 李亚：《物之贸迁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以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的桐油贸易为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1 期。

⑪ 崔继来：《明清时期江西的造砖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⑫ 章毅、黄一彪：《晚清内销茶商的季节性经营和跨地域流动：以泰昌发介号〈淳庄账簿〉为中心》，《史林》2022 年第 1 期；黄一彪、龙登高：《晚清浙江京茶庄的歙县宗族伙计——基于泰昌发介号淳庄的考察》，《中国农史》2022 年第 6 期。

⑬ 朱英、钟元泽：《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江汉论坛》2022 年第 11 期。

⑭ 江泰新、苏金玉：《回顾与前瞻——以明清时期商品和市场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⑮ 倪玉平：《清代经济重心的东移》，《南国学术》2022 年第 3 期。

⑯ 余康：《清代两淮盐务中的引窝资本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⑰ 王振忠：《18 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学术月刊》2022 年第 5 期。

纠纷如何促使近代中国商法体系的确立与转型。[①] 叶农梳理了鸦片战争后香港与上海的转口贸易的阶段性特点。[②] 魏静怡、杨培娜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对清代中后期广东硝石输入不断增加、硝石贸易从出口转向进口的过程作了探究。[③] 刘秋根、刘新龙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甘草这一北部边疆大宗药品的市场体系与国际贸易变迁问题。[④] 晚清中外之间的经济博弈与抵制外货运动也有多篇成果。[⑤]

不同地域商人、商帮与会馆的研究依旧得到学者的关注。晋商研究中，李锦彰、曹树基考察了山西当铺账本独特的复式簿记、现金流量控制和每月损益计算制度。[⑥] 张喜琴等人对乾隆至民国晋商股权结构的演变及其推动因素进行了探究。[⑦] 周亚、李善靖以恒隆光票号账簿为例探讨了票号账簿的归户、特征与价值。[⑧] 张俊峰、白如镜探讨了清代山西碛口镇作为一个黄河市镇的社会经济变迁与总体发展。[⑨] 徽商研究中，俞江《清代的合同》一书对清代合同的起源、类型等各方面内容都做了深入研究。[⑩] 得益于徽州文书抄本史料的利用，王振忠等探讨了清代徽商在钱塘江流域从事木业经营的情况，也考察了 20 世纪前期旅外徽人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⑪] 孙丽、袁为鹏以晚清徽商兆成号盘单为核心资料，指出晚清徽商合伙经营与管理具有稳健性特征。[⑫] 梁仁志通过对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的研究，指出该家族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⑬] 程泽时对嘉庆年间徽州婺源“寄小伙”这一合伙过渡形式做了研究。[⑭] 周晓光、张成儒探讨了近代徽州商人在桐油贸易中经营油号的生产、运输到销售的整套行为。[⑮] 会馆研究方面，许檀主要利用商人会馆碑刻资料，考察了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⑯] 陈宝良、周远航考察了明清会馆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时段的功能。[⑰] 邱澎生新著则对 18、19 世纪苏州出现的新兴工商业团体进行了研究。[⑱]

（五）近代工业与企业发展

李志茗指出晚清早期洋务企业的种种弊端与其幕府管理体制有关。[⑲] 杜恂诚考察了中国近

---

① 熊昌锟：《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② 叶农：《江海之间：鸦片战争后的香港与上海转口贸易》，《南国学术》2022 年第 1 期。

③ 魏静怡、杨培娜：《全球贸易变动背景下清中后期广东硝石输入的增加》，《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④ 刘秋根、刘新龙：《晚清民国时期北部边疆甘草市场及国际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⑤ 孟凡礼：《粤汉铁路建设过程中的对美交涉（1900—1905）》，《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朱英：《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江海学刊》2022 年第 1 期；朱英：《从抵制美货运动看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新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王慧颖：《上海美侨对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观察与因应》，《史林》2022 年第 4 期；费驰、孟二壮：《近代在华日本商业会议所对中国经济调查研究》，《史学集刊》2022 年第 4 期。

⑥ 李锦彰、曹树基：《传统时代山西当铺账本的复式簿记与会计核算》，《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⑦ 张喜琴、赵永斌、刘建生：《乾隆至民国晋商股权结构演变简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⑧ 周亚、李善靖：《论票号账簿的归户、特征与价值——以恒隆光票号账簿身份考证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⑨ 张俊峰、白如镜：《清以来山西沿黄市镇的历史、景观和地域社会——以晋西碛口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⑩ 俞江：《清代的合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⑪ 王振忠、朱慧敏：《从〈做杉木放牌要览〉看清代徽商在钱塘江流域的木业经营》，《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2 期；王振忠：《二十世纪前期旅外徽人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关于〈抄写录〉抄本之解读》，《学术界》2022 年第 9 期。

⑫ 孙丽、袁为鹏：《晚清徽商合伙经营之稳健性特征——以兆成商号史料为中心》，《安徽史学》2022 年第 4 期。

⑬ 梁仁志：《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22 年第 6 期。

⑭ 程泽时：《从利润非均到照本分利：徽州婺源“寄小伙”——以汪养佳嘉庆八年至二十五年流水账为中心》，《学术界》2022 年第 9 期。

⑮ 周晓光、张成儒：《近代湖南桐油贸易中的徽州油商——以洪江王万和盛号油店为中心》，《学术界》2022 年第 6 期。

⑯ 许檀：《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⑰ 陈宝良、周远航：《明清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安徽史学》2022 年第 6 期。

⑱ 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年。

⑲ 李志茗：《以“局”论局：中国近代企业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代在华外商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代理经营制度的内容及特点。[①] 张忠民考察了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产权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与特征。[②] 李时雨关注到甲午战争前中日双方在朝鲜汉江流域围绕汽船航运业所展开的博弈。[③] 薛轶群的新著则聚焦于近代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与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问题。[④] 于新娟肯定了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腹地乡村所起的能动作用。[⑤]

三、思想文化史

（一）学术与思想

有关传统学术的研究涉及理学、儒学、史学、音韵学等诸多内容。其中多篇论文专门研究桐城文派，涉及其自身的特征以及后期的分野。[⑥] 理学研究中，黄振萍对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提出质疑，认为要回归历史语境探究其出现的原因。[⑦] 杨正显考察了清中叶阳明学如何以“经世之学”的姿态重返学术场域的过程。[⑧] 宣燕华探讨了清初经学与理学的复杂关系，同时对余英时“内在理路说”进行了批判性反思。[⑨] 另外，马建春考察了明末清初回族知识界在江南兴起的“以儒诠经”的学术思潮。[⑩] 屈宁对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及其对乾嘉史学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究。[⑪] 秦曰龙、汪银峰考察了樊腾凤《五方元音》在明清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上的重要影响。[⑫] 戚学民讨论了《续文苑底稿》的史料价值，并考察了其中有关性灵诗学的记载。[⑬]

关于清代思想史，王东杰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乌托邦作品，展现了近代中国思想基本取向从无为到理性规划的转变。[⑭] 彭春凌考察了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斯宾塞种族进化、竞争论述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认为知识界对斯宾塞的翻译为近代政治变革酝酿了社会气氛。[⑮] 李恭忠梳理了从西方和日本的“万国史”到梁启超“新史学”的知识传播与话语流转过程，重现了 20 世纪初中国史学初创时的背景、目标与困境。[⑯] 於梅舫通过对梁启超《近世之学术》一文的研究，指出该文蕴含着梁启超展望、组织未来中国新文化以容纳中

---

① 杜恂诚：《中国近代企业中的代理经营制度——以在华外商企业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 张忠民：《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③ 李时雨：《甲午战前中日在朝鲜汉江围绕汽船业的博弈 (1892—1894)》，《史林》2022 年第 3 期。

④ 薛轶群：《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 (1870—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⑤ 于新娟：《近代上海工业发展与长三角腹地乡村的经济互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⑥ 有关桐城文派的研究，有张知强：《邓廷桢幕府与“后姚鼐时代”桐城派的传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刘文龙：《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安徽史学》2022 年第 3 期；蒋明恩：《义理降格与桐城派末期文学的分野》，《青海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张秀玉：《清末民初桐城派士人的“倔强坚守”——以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22 年第 4 期。

⑦ 黄振萍：《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⑧ 杨正显：《清中叶阳明学的复返：“王刘会”的成立与活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22 年 第 117 期。

⑨ 宣燕华：《清初古文〈尚书〉辨伪与理学的关系——兼议余英时“内在理路说”》，《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⑩ 马建春：《明末清初“以儒诠经”起因再探讨》，《南国学术》2022 年第 2 期。

⑪ 屈宁：《再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⑫ 秦曰龙、汪银峰：《清代汉语语音史谱系建构——“五方元音一系韵书”脞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⑬ 戚学民：《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社会科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戚学民：《性灵派登场：论对乾隆朝诗学史的续写》，《东南学术》2022 年第 6 期。

⑭ 王东杰：《从“桃花源”到“乌托邦”：〈大同书〉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⑮ 彭春凌：《进化之调律：斯宾塞与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⑯ 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历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西学术的抱负。[①] 裘陈江利用新见章氏佚信考察了章太炎与孙至诚的交往。[②]

概念史在思想文化史中占比不少。黄兴涛、黄娟探讨了传统的“国语”概念在清末发生的转换以及这一时期国家通用语构建的过程。[③] 王宏斌梳理了晚清“外洋”一词的嬗变及其与西方领海观念输入的关系。[④] 王鸿指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文明”观念具有“进步”和“政治强权”这两种悖论性内涵。[⑤] 俞祖华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演变。[⑥] 李帆对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相关表述进行了梳理。[⑦] 顾少华关注到华盛顿在美国建国历史叙事中的形象转变及其与清末革命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⑧]

（二）文化政策

祁美琴、胡晓明探讨了清代皇帝执政中“执两用中”的特点。[⑨] 孟尧从皇权对儒家道统原义的辩难和消解的视角，重新考察了雍正朝文字狱的具体机制。[⑩] 贾小叶系统梳理了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刊发的文章、政论，指出其中体现了梁启超关于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⑪] 高学姣指出《大义觉迷录》一书的创作出版与流通阅读也是雍正帝建构清朝“正统观”的独特体系、形塑并强化中央与地方各类社会群体对于相关事件记忆的过程。[⑫] 胡晓明讨论了乾隆时期“经筵御论”的政治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⑬]

（三）文化交流

韩琦考察了在欧洲数学知识传入后，明清士人对《周髀算经》的定位与解读。[⑭] 周理乾揭示了清初历法之争中所体现的西方传教士、中国儒家保守人士、回回科天文学家以及皇帝之间的政治博弈。[⑮] 柯卉以《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为中心考察了中德语言的接触历程。[⑯] 杨瑞关注到“法系”一词的发端及其在 20 世纪初引进中国后的发展历程，指出法系知识生产与演化背后的法律与政治文明新陈代谢问题。[⑰] 在中外文化交流领域，不少学者关注清季国人的知识认知问题。邱志红梳理了近代国人对新西兰的认识的演变。[⑱] 谭丹关注到了在西学传入的背景下，近代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发端与演变。[⑲] 也有学者探讨了近代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问题。崔华杰讨论了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揭示了中国历史在英语世界的形成过程。[⑳] 刘彦考察了 19

---

① 於梅舫：《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理念》，《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② 裘陈江：《章太炎与孙至诚交往论学始末——以新见章氏佚信的考释为核心》，《史林》2022 年第 4 期。

③ 黄兴涛、黄娟：《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④ 王宏斌：《晚清“外洋”词义嬗变之历史学解析（1862—1911）》，《史学月刊》2022 年第 2 期。

⑤ 王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文明”观念》，《史林》2022 年第 3 期。

⑥ 俞祖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 7 期。

⑦ 李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初步觉醒——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谈起》，《史学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⑧ 顾少华：《“华盛顿形象”与清末革命话语的建构》，《历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⑨ 祁美琴、胡晓明：《清朝皇帝“执两用中”思想与实践探赜》，《河北学刊》2022 年第 6 期。

⑩ 孟尧：《清代皇权对儒家道统原义的辩难和消解——雍正朝文字狱新探》，《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⑪ 贾小叶：《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⑫ 高学姣：《〈大义觉迷录〉的文本流播与记忆再现》，《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⑬ 胡晓明：《乾隆时期“经筵御论”思想探赜》，《历史档案》2022 年第 3 期。

⑭ 韩琦：《西学新知与历算传统的再发现——政治文化视域下明清士人对〈周髀算经〉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⑮ 周理乾：《清初“历法之争”再研究——知识、修辞与权力》，《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⑯ 柯卉：《中德早期语言接触史研究——以〈额呼马尼雅语〉与〈德字初桄〉为中心》，《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⑰ 杨瑞：《清季民初法系知识的东学背景及其传衍》，《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⑱ 邱志红：《极目南望：晚清国人关于新西兰认知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⑲ 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人文杂志》2022 年第 1 期。

⑳ 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世纪俄国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问题。①

（四）文化教育

近代学堂与留学教育的研究中，桑兵厘清了 1901 年各省兴办大学堂一事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此事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影响。② 郭书愚、李宗庾揭示了清季“新政”之初枢府改书院为学堂的实际运作情况。③ 徐冠华考察了山西大学堂派遣学子赴日、英留学的时代背景、留学政策、学习专业、回国影响。④ 闫欣芳、杨舰对洋务时期中国留学生伍光建与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学者卡尔·皮尔逊的通信与交往进行了研究。⑤ 米惠华探讨了清末民初留美生的专业选择、培养方式和就业质量。⑥ 周赫、乌云毕力格对清末锡良在东北施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及其对东北近代教育的推动作用进行了探究。⑦ 徐志民等的新著考察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团体活动。⑧

（五）文化传播

本年度有不少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了清代的出版文化、书籍生产流通、书籍市场等问题。⑨ 张婷著《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分析了清代法律知识的商业出版与传播，以及其对司法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冲击。⑩ 蒋建国从书籍阅读的角度，探讨了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并将其影响称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⑪ 陈灿彬将清代嘉兴府士人给朱彝尊《曝书亭集》作注及其出版流通、阅读接受的过程称为“诗注再生产”，指出这一过程是不断更新的。⑫ 陈拓探讨了嘉道时期天主教会在北京的书籍刊刻活动。⑬ 有关近代报刊及其舆论导向问题，黄飞考察了中法战争时期《申报》对“清流”与洋务派争论的舆论参与及其立场变化。⑭ 石希峤对清末督抚大规模收购民营报纸的舆论运作策略进行了探讨。⑮

（六）文献研究

韩超对国家图书馆藏卢文弨《群书校正》的真伪及其价值进行了细致探究。⑯ 王嘉川、夏芷晴考订了浦起龙校勘《史通》时所用的诸版本。⑰ 本年度有多篇研究《四库全书》的论文，其中苗润博细致梳理了清修《四库全书》中纪事本末类的设立过程及其概念、范畴演变，反思了重大学术史变革背后的时代因素。⑱ 琚小飞对《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中所呈现的《四库全书》早

---

① 刘彦：《“天下”比邻：19 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下俄国的中国形象建构》，《开放时代》2022 年第 5 期。

② 桑兵：《清末各省大学堂与现代中国大学的缘起》，《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③ 郭书愚、李宗庾：《清季改书院为学堂的实际运作与社会影响——以校士馆为中心的考察》，《江汉论坛》2022 年第 2 期。

④ 徐冠华：《晚清新式学堂留学教育活动及影响研究——基于山西大学堂留学教育活动的分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⑤ 闫欣芳、杨舰：《洋务留学生伍光建与卡尔·皮尔逊的交往》，《自然科学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⑥ 米惠华：《清末民初留美生的人才培养与就业状况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⑦ 周赫、乌云毕力格：《锡良在清末东北的教育改革考述》，《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⑧ 徐志民、孙安石、大里浩秋：《团体与日常：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⑨ 潘超：《“魁星鳌头”：东亚汉籍出版中的魁星印文化》，《文献》2022 年第 4 期；陈晓峰：《清初“文人共同体”的书籍生成与流通——以张潮〈尺牍偶存〉〈尺牍友声〉为考察中心》，《江海学刊》2022 年第 5 期；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史学月刊》2022 年第 9 期。

⑩ 张婷：《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张田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⑪ 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⑫ 陈灿彬：《嘉兴后学与朱彝尊诗注的再生产》，《文献》2022 年第 2 期。

⑬ 陈拓：《断裂与延续：嘉道时期北京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6 期（2022 年）。

⑭ 黄飞：《由“战”转“和”：中法战争时期〈申报〉的舆论导向》，《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⑮ 石希峤：《官办商报：清末督抚控制舆论策略研究》，《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⑯ 韩超：《卢文弨〈群书校正〉的真伪及其价值》，《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⑰ 王嘉川、夏芷晴：《浦起龙校勘〈史通〉所用诸本考》，《史学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⑱ 苗润博：《曲解与泛化：〈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衍生史辨》，《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期编纂的相关史事及四库馆纂办书籍的细节进行了研究。[①] 李振聚考察了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②] 陈腾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郑师愈退轩本《吴梅村先生诗集》进行了比勘与考证。[③] 吉毛措对清代嘉绒土司馆藏藏文文献内容与表达方式进行了细致研究。[④] 李勤璞考察了藏文写本《西藏驿站表》的内容、真实性与价值。[⑤]

（七）宗教信仰

本年度的宗教史研究中，赵新平、王超宇考察了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构成及善举。[⑥] 邵佳德探讨了近代中国“佛教”概念的重新发明如何影响了宗教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佛教徒的信仰实践。[⑦] 陈泳超考察了明清时期以神道之名为题的宝卷叙事的情节模式与功能导向。[⑧] 李贵海对药王信仰在弘阳教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究。[⑨]

四、边疆民族史

本年度出版的边疆史论著中，孙喆、张永江所著《百年清史研究史・边疆民族卷》探讨了百年间中国学术界的边疆民族研究，尤其是清代边疆民族研究的发展历程，是对百年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整体性反思。[⑩] 高福顺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中国边疆研究者应以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为核心，确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⑪]2022 年 6 月“第九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与会学者们对边疆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丰富了边疆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一）北方地区

赵毅利用满文档案考察了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处理办法。[⑫] 宝音朝克图对清代漠北金山卡伦的名称、设置时间、方位、撤卡与复设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⑬] 吴昌连、双宝聚焦于清朝奏蒙古事侍卫这一群体，指出他们在维系清廷与边疆地区政教人事之间感情以及巩固民族团结上的贡献。[⑭] 邓涛强调了长城沿线直省地区从军事、行政、后勤等多方面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的作用。[⑮]

孙喆、陈雅瑶通过考察清代新疆驻扎大臣建置沿革、职能行使状况，指出嘉道时期清廷对新疆依然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并对“嘉道中衰”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⑯] 惠男探讨了哈密归附清朝以来额贝都拉与哈密扎萨克旗的活动及前者在协助清朝监控准噶尔汗国时所发挥的作

---

① 琚小飞：《〈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新探——基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的研究》，《文献》2022 年第 3 期。
② 李振聚：《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考述》，《文献》2022 年第 3 期。
③ 陈腾：《退轩抄本〈吴梅村先生诗集〉考述》，《文献》2022 年第 2 期。
④ 吉毛措：《清代嘉绒土司馆藏藏文文献内容及其语言文字特征研究》，《西藏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⑤ 李勤璞：《清代藏文写本〈西藏驿站表〉初研》，《文献》2022 年第 5 期。
⑥ 赵新平、王超宇：《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研究——以繁峙县为例》，《五台山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⑦ 邵佳德：《近代中国“佛教”概念的重新发明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⑧ 陈泳超：《明清教派宝卷中神道叙事的情节模式与功能导向》，《西北民族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⑨ 李贵海：《明清弘阳教与华北地区药王信仰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⑩ 孙喆、张永江：《百年清史研究史・边疆民族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⑪ 高福顺：《形而下之道：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论刍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⑫ 赵毅：《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获得与应对》，《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⑬ 宝音朝克图：《清代漠北金山卡伦考》，《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⑭ 吴昌连、双宝：《清朝奏蒙古事侍卫再探》，《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⑮ 邓涛：《长城沿线直省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⑯ 孙喆、陈雅瑶：《从驻扎大臣制度的演进看嘉道时期对新疆的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用。[1] 英卡尔·巴合朱力考察了清中期清廷对哈萨克黑骨阶层授予顶翎政策及其与西北边疆治理的关系。[2] 张伯国对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的施政思想及清朝推行德政以化回人政策进行了梳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以金顶回人制度为核心探讨了清代南疆基层伯克培养选拔问题。[3] 刘锦增对新疆铜矿开采的历时性过程进行了梳理。[4] 王东平以道光二十八年（1848）阿克苏所属萨依里克军台发生的一桩命案为切入点，考察了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的特点。[5] 巴哈提·依加汉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三封察合台文求药信，考察了求药信背后反映的文化会通现象。[6]

刘文鹏、李伯禹考察了近代以来嫩漠路的沿革，指出晚清民国时期嫩漠路带有巩固边防和边疆治理的色彩。[7] 李佳对明清两代在辽东地区管理策略的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清代设置的盛京将军辖区显示了其宣扬本朝政权合法性与优越性的政治诉求。[8]

（二）南方与青藏地区

罗群考察了历朝对云南边疆地位与重要性的历史书写和建构。[9] 曾现江指出清末民初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现象的根源在于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10] 徐法言探讨了清廷平定大、小金川后金川地区复杂多元的宗教格局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11]

吕昭义、柳树通过对“梭里村护照原件”及相关中外文档的梳理，强调中国对察隅境域，包括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下察隅、杜莱河谷地方在内的领土主权是有史料依据的。[12] 杜常顺、许若冰考察了清代甘边地区抚番厅的设置、官吏选任、官署构成及基层权利秩序。[13] 周智生、李铭对历次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行军路线、后勤供应及其影响进行了梳理，指出滇军三次入藏促进了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14]

南岭和台湾地区也得到了学者关注。吴滔讨论了明清时期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的发端及其运作实态。[15] 郭满考察了清廷将内陆边疆民族治理政策施行于台湾的过程，并指出台湾的经验也被内地所参照。[16]

五、社会史

社会史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至今，已历四十余年。本年度不少学者就社会史研究各领域展开了整体性反思。王先明通过梳理近四十年华北区域史的发展脉络、学术聚焦、研究取

---

① 惠男：《关于归服清朝以来的额贝都拉与哈密扎萨克旗的活动（1697—1701）》，《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② 英卡尔·巴合朱力：《顶翎与治边：清朝对哈萨克的顶翎政策（1765—1849）》，《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③ 张伯国：《德化推行与认同塑造：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及其实践》，《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张伯国：《金顶回人制度与清代南疆基层伯克培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④ 刘锦增：《清代新疆铜矿开采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⑤ 王东平：《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事重案的审理——基于道光朝阿克苏吴廪年案的考察》，《清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⑥ 巴哈提·依加汉：《乾嘉时期写往清廷的三封察哈台文求药信及其反映的文化会通现象》，《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⑦ 刘文鹏、李伯禹：《“黄金之路”考辨——近代以来嫩漠路的沿革》，《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⑧ 李佳：《从边镇到盛京：明清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区划与管理策略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⑨ 罗群：《边疆观的历史书写与建构——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⑩ 曾现江：《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西藏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⑪ 徐法言：《改土归屯后金川地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民族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⑫ 吕昭义、柳树：《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赵尔丰察隅境域“护照”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⑬ 杜常顺、许若冰：《清代甘边地区的抚番厅与地方治理》，《民族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⑭ 周智生、李铭：《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民族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⑮ 吴滔：《在免差与应役之间：明清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之缘起及其运作》，《史学集刊》2022 年第 1 期。

⑯ 郭满：《图像、仪礼与秩序——清代台湾社番的政治谱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向、学理建构，指出了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困境与前景。① 行龙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建设走向。② 张俊峰则强调“以水为中心”的观点，提出了从水利社会史到水的社会史的发展路径。③ 这些反思对清代社会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基层社会治理

冯贤亮对清代江南乡村控制中的治安维护及其前后变化情况做了梳理。④ 郝平、魏春羊探讨了明清时期华北地区乡村组织功能扩大化的背景与原因，指出乡村组织功能扩大化是晚明以来的趋势。⑤ 张旭等人探讨了清代清水江中下游乡村治理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⑥ 党晓虹等人通过对明清以降云南 149 份传统乡规民约内容量化分析发现，云南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经历了“传入初创期—推广爆发期—稳定发展期”三个阶段。⑦ 王洪兵、张松梅以顺天府宝坻县为研究对象，认为清代乡里制度的实践运作是国家政权与乡村自治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⑧ 赵克生对清代乡贤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做了细致探究。⑨

（二）水利与社会

水利社会史关注因水而起的纠纷与地方社会秩序塑造的问题。肖启荣指出明清时期的环境、政策与市场共同塑造了淮扬地区基层水利社会特性。⑩ 罗晓翔讨论了无锡县城显应桥下石坝发生的水利冲突，指出这一冲突背后呈现了晚清城乡间的文化对抗。⑪ 赵彦民利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的邢台水利调查资料考察了河北邢台周围的闸会组织。⑫

（三）宗族、民俗与信仰

宗族研究中，常建华考察了乾嘉刑科题本中记录的两湖地区宗族的内部矛盾与经济纠纷。⑬ 赵凯欣探讨了婺源汪氏湖山墓祠及清中后期徽州出现的墓祠复兴现象。⑭ 刘正刚、张柯栋梳理了浙江永康孔氏“圣裔”谱系建构的历时性过程。⑮ 黄志繁以江西赣南赖氏宗族为中心探讨了清代族产的形成与演变。⑯ 施由明指出清代江西诉讼案呈现宗族化倾向，宗族公产诉讼也助长了当地的争讼之风。⑰ 王跃生考察了清代中期的立嗣过继问题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层级“家”的复杂

---

① 王先明：《界域建构中的困境及其反思——立足于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② 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三大体系”建设刍议》，《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③ 张俊峰：《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空间、类型与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④ 冯贤亮：《清代江南乡村的社会治理及其变化》，《史学集刊》2022 年第 1 期。

⑤ 郝平、魏春羊：《明清华北乡村组织功能扩大化及其原因探析——以太行山村社碑刻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22 年第 2 期。

⑥ 张旭、王砚旭、龙昭宝：《清代清水江中下游的乡村治理——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

⑦ 党晓虹、刘新民、莫力：《明清以降云南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演进及其逻辑（1368—1949）》，《中国农史》2022 年第 4 期。

⑧ 王洪兵、张松梅：《皇权下县：清代乡里制度实践运作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东岳论丛》2022 年第 3 期。

⑨ 赵克生：《从“沿明旧制”到“渐立新规”——清朝对乡贤冒滥之弊的制度化治理》，《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⑩ 肖启荣：《防洪、水运、环境与水利社会：明清淮扬地区基层水利纷争的个案研究》，《史林》2022 年第 6 期。

⑪ 罗晓翔：《清代城乡对抗中的水利之争与文化之争——以无锡显应桥冲突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⑫ 赵彦民：《共有资源视域下的华北农村水利组织研究——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6 卷）邢台水利调查资料为中心》，《民俗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⑬ 常建华：《清乾嘉刑科题本所见两湖地区宗族及其纠纷》，《史林》2022 年第 2 期。

⑭ 赵凯欣：《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⑮ 刘正刚、张柯栋：《冲突与调适：明清永康榉溪孔氏的“圣裔”谱系建构》，《史林》2022 年第 5 期。

⑯ 黄志繁：《从全族共有到股份自愿：试论清代族产的形成与演变——以江西石城长溪赖氏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⑰ 施由明：《论清代江西宗族与争讼之风的应对》，《中国农史》2022 年第 6 期。

关系。①

在民间信仰方面，赵倩梳理了晚清三皇姑信仰从区域神祇到祀典神明的正统化历程。② 濮文起通过对《土地宝卷》的考察指出清代民间具有较强的造神能力与勇于挑战权威的创新精神。③ 龚俊文、陈业新考察了明清福建临水夫人祠庙的数量与分布以及该信仰的变迁。④

（四）边缘群体、社会生活与城市变迁

卞利考察了清代徽州棚民群体的结构性组成特征及其资金来源。⑤ 常建华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对嘉庆时期乡村乞丐和戏班艺人的生活状态与人际纠纷进行了研究。⑥

汪苑菁在其新著中探讨了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商业报纸《汉口中西报》的关系。⑦ 翟建对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加背景下本地农业经营的分化、农业劳动分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进行了探究。⑧ 罗婧著《繁华之始：上海开埠初期租界地区洋行分布与景观变迁 (1843—1869)》考察了晚清上海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并探讨了洋行在上海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⑨

（五）妇女与性别

晏雪莲对清代澳门土生葡人寡妇群体的经济活动及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进行了探讨。⑩ 毛立平探讨了清代巴县档案中非贞洁因素的女性自杀问题。⑪ 袁宙飞、李璐佳对清末民初的改良年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礼俗秩序的变迁进行了讨论。⑫ 邱大昕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女性盲人教育问题作了探究。⑬ 武洹宇以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个案探讨了中国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⑭ 也有不少研究注意到了女性的文化活动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问题。⑮

六、人与自然关系史：地理、环境、灾害、疫疾等

以上各专题基本上讨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史，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则在

---

① 王跃生：《清中期立嗣过继中家庭与家关系分析》，《清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② 赵倩：《传说与社会：晚清三皇姑传说的重构与正统化》，《民俗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③ 濮文起：《大闹天宫的土地爷——〈土地宝卷〉试析》，《民俗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④ 龚俊文、陈业新：《历史景观地理视角下的明清福建临水夫人信仰研究——以祠庙为中心》，《中国农史》2022 年第 6 期。

⑤ 卞利：《清代徽州棚民的结构组成与基层社会生态——以清代嘉庆年间休宁县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为例》，《中国农史》2022 年第 3 期。

⑥ 常建华：《清中叶乞丐的人际纠纷与社会边缘性——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东岳论丛》2022 年第 3 期；常建华：《人生如戏：清嘉庆时期民间演戏纠纷及艺人——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学术界》2022 年第 3 期。

⑦ 汪苑菁：《打造“东方芝加哥”：〈汉口中西报〉与晚清汉口城市文化的嬗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⑧ 翟建：《近代上海城市人口扩张与本地农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⑨ 罗婧：《繁华之始：上海开埠初期租界地区洋行分布与景观变迁（1843—1869）》，同济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⑩ 晏雪莲：《清代澳门土生葡人寡妇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⑪ 毛立平：《清代女性自杀案件的司法审理与性别隐喻——以巴县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0 期。

⑫ 袁宙飞、李璐佳：《性别 · 角色 · 场域：改良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民俗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⑬ 邱大昕：《我不是“盲妹”：近代华人女性盲人的生命故事》，《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39 期（2022 年）。

⑭ 武洹宇：《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 年第 5 期。

⑮ 马勤勤：《王妙如：被忽视的女权先驱——兼及佛学与晚清女权思想的发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杨力：《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女性：中国性科学萌芽的跨语际分析》，《河北学刊》2022 年第 3 期；曹晓华：《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1898—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年；张宏生：《闺阁的观物之眼——清代女诗人的咏物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张宏生：《内闱与外乡：清代女性诗歌中的寄外书写》，《学术研究》2022 年第 2 期；宋清秀：《清代闺秀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审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钱南秀、杨联芬：《对谈：“列女”“贤媛”传统与中国女性文化的现代转型》，《妇女研究论丛》2022 年第 6 期。

传统的历史地理和新兴的灾害史、疫病史和环境史研究中各有显现。其中，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区域环境与生计选择、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疾病医疗史等方面均出现新的探讨。肖红松、王永源揭示了白洋淀地区自然环境、市场以及政府政策因素下当地民众的生计选择与苇席业的发展。[①] 惠富平等人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麦作发展及其在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稻作农业生态以及维持农民生计上的作用。[②] 马斗成、董书凯对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胶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引起胶州湾北海岸淤变加剧的过程进行了考察。[③] 贾国静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考察了清代黄河尾闾治理中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复杂适应性。[④] 赵珍新著对清代京畿地区的人—水关系做了全面的勾勒，重申了资源利用是环境史研究的核心价值这一学术关怀。[⑤] 王建革、由毅指出清中期以后淮水的泄洪选择与水环境变化、工程技术以及清政府的运河策略有着密切关系。[⑥] 陆烨围绕噪音这一城市环境问题，指出了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中各方的争论、博弈与共识。[⑦]

灾荒、疾病亦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相互纠缠的关系，故将本年度灾荒史、疾病医疗史的相关研究在此一并梳理。在水旱灾害及其治理方面，宋儒指出 1757 年的洪水灾害激发了河东盐务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⑧] 张佩国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后海宁州地方在水利兴修、市场恢复与地方善举等事宜中如何重建地域社会秩序的问题。[⑨] 卜凡考察了明清时期文安洼的水患及其治理措施。[⑩] 萧凌波对清代中期直隶灾后跨省赈粮数量进行了定量重建，分析了政府救灾力度的总体变化趋势及时空分布特征。[⑪] 李光伟指出《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帝的灾异观念篡改了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并对两朝帝王的灾异观进行了探讨。[⑫] 路红霞讨论了清代因灾清理刑狱的制度、实践及影响。[⑬]

有关慈善与赈济的研究中，张书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及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⑭] 王卫平、潘伟峰驳斥了雍正帝谓慈善乃“道婆之政”是其不重视慈善的表现一说，认为雍正时期慈善事业有较大发展。[⑮] 黄鸿山考察了苏州绅士谢家福在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中的义赈活动，指出此次义赈中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⑯]

本年疾病医疗史研究多关注中西医交流、疫情防控制度、检疫制度与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冯玉荣对《清史稿》医者传的编纂与书写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史家与医家的医史书写共同推动了中医知识的传播与创新。[⑰] 刘希洋考察了清代疫情期间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的活动。[⑱] 余新忠从生命史学的视角探讨了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

---

① 肖红松、王永源：《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与民众生活》，《史学集刊》2022 年第 3 期。

② 惠富平、陆勇、钱伶俐：《明清太湖地区麦作发展及其社会效益》，《中国农史》2022 年第 6 期。

③ 马斗成、董书凯：《新作物扩张与晚近胶州湾海岸淤变“再加速”——以红岛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④ 贾国静：《黄蓝相会：清代黄河尾闾治理的生态史考察》，《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⑤ 赵珍：《浮天载地：清代京畿水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⑥ 王建革、由毅：《清中后期清政府保运体系中的淮水入海入江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1 期。

⑦ 陆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⑧ 宋儒：《1757 年盐池大水与河东盐务危机》，《中国农史》2022 年第 2 期。

⑨ 张佩国：《晚清海宁州的水利、市场与地方善举》，《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⑩ 卜凡：《“釜底之水”：明清时期文安洼的水患与治理》，《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⑪ 萧凌波：《清代中期直隶灾后跨省赈粮调度的定量重建与特征分析》，《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⑫ 李光伟：《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⑬ 路红霞：《感召天和：清代因灾清理刑狱》，《青海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

⑭ 张书：《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⑮ 王卫平、潘伟峰：《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江海学刊》2022 年第 1 期。

⑯ 黄鸿山：《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⑰ 冯玉荣：《“授受源流”：〈清史稿〉医者传的编纂与医史的承启书写》，《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⑱ 刘希洋：《检方施治：防疫方书与清代的疫情防控》，《清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界。[1] 杜丽红梳理了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运作经费来源，也对清末东北大鼠疫中防疫决策的执行与防疫过程中中西医的博弈进行了探讨。[2] 杨祥银指出近代香港早期性病问题背后的治理措施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特征。[3] 姬凌辉《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一书对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4]

历史地理领域也有不少推进。有关地图与地理文献的研究中，张佳静以利玛窦以来至清末中国的“天下总图”为研究对象，判定了其投影类型。[5] 孙景超对德藏《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的生成背景与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6] 刘仕格、张萍考订了国家图书馆藏清彩绘本《宁夏河渠图》的绘制时间。[7] 沈卡祥发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云南”图中的绘制错误。[8] 吴松弟介绍了晚清民国时期测绘出版的近千幅旧海关地图的绘制时间、数量的空间差异、内容、来源与特点。[9] 人文地理方面，邹振环新著探讨了 16 至 19 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形成的汉文西学地理文献。[10] 陈章对清代“北五省”与“南五省”地理概念发端与废止进行了考订。[11] 李昕升著《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分析了玉米、番薯这一类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本土化的分布及变迁过程。[12] 政区地理方面，许若冰、杜常顺考察了清代岷州的政区调整与州县化转型过程，认为其背后体现的是明清以来边疆地区行政制度的变迁轨迹与总体趋势。[13] 董嘉瑜详细考订了清初四川总督的设置沿革与治所变迁。[14] 胡恒总结了清代归绥地区的厅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认为这一变化过程受到国家整体行政制度以及区域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在其新书《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中，他对清代厅制的起源与演变进行细致的探究，并结合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厅的地方表现形态。[15]

七、总结

从以上梳理来看，学者们通过对清代国家治理能力、地方社会治理、近代工业与企业发展、金融与市场发育、中西交流、传统文化发展转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丰富对清代社会及其近代转型的思考。

实际上，上述的实证研究背后都体现了一定的史观与研究方法。近年来，对旧有的史观与方法尤其是西方的学说，反思更为深入。政治史、边疆史力图通过对清代国家大一统问题的讨

---

① 余新忠：《以新守旧 以中化西——近代天津名医丁国瑞的中西医汇通之道》，《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 杜丽红：《近代中国的海港检疫及经费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杜丽红：《权力结构与防疫模式：清末东北大鼠疫期间防疫决策的执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策略的文化冲击探析》，《人文杂志》2022 年第 10 期。

③ 杨祥银：《近代香港早期的性病问题与立法（1841—1867）》，《清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④ 姬凌辉：《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年。

⑤ 张佳静：《明清时期“天下总图”中投影地图的临摹与绘制》，《自然科学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⑥ 孙景超：《德藏晚清吉林〈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考释》，《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⑦ 刘仕格、张萍：《国图藏清彩绘本〈宁夏河渠图〉绘制时间考》，《文献》2022 年第 4 期。

⑧ 沈卡祥：《〈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云南”图顺宁、永昌府界及蒗蕖、南甸土司治所新考四则》，《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⑨ 吴松弟：《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旧海关地图探析》，《历史地理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⑩ 邹振环：《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中华书局，2022 年。

⑪ 陈章：《清代“北五省”与“南五省”地理概念探源》，《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⑫ 李昕升：《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⑬ 许若冰、杜常顺：《卫所变革与边地形塑：清代岷州的政区演进与社会重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⑭ 董嘉瑜：《清初四川总督建置与驻地研究》，《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⑮ 胡恒：《从理事到抚民：清代归绥地区厅制变迁新探》，《清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

论，对新清史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学理性的回应。① 而通过对清代国家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一些新的解释框架被提出。如张泰苏试图打通“唐宋变革”论与“大分流”这两大经典议题，找到贯穿中国宋元明清历史发展的长期线索。② 李怀印则提出“三重均衡态”的理论模型，试图以此重新理解清代国力盛衰的原因。③《历史研究》刊发了高翔等人对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的新讨论，提出“自主限关”更能概括明清时期中国当政者的主要对外政策。④ 这一说法在学术界激起比较强烈的反应，虽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却也显示出中国学者多元化自主探索的努力。

清史学科建设与方法论层面也多有新见。本年度，有关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而晚清史作为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紧跟这一学术动态。2022 年，《近代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先后组织了圆桌会议探讨近代史发展的理论问题。⑤在“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圆桌讨论中，王先明、左玉河、郑大华、崔志海分别就近代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特性以及晚清史中的革命史范式与民族主义范式作了探讨。⑥ 总体上看，研究者们大多主张拉长研究时段，从明清以来探讨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并且对于革命史范式、中国中心观、“国家与社会”范式以及“冲击—反应”论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批判性思考，主张审慎地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反思之外，学界也开始提倡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本年度《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主题为“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的笔谈，标志着环境史研究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和趋向，乃至具有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在本组笔谈中，王利华、梅雪芹、姜涛、朱浒、马俊亚、王建革等几位学者，既关注近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个案，又探讨了近代环境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发展前景，学者们都强调把人与自然这一对关系引入近代史研究中，对以往政治史、革命史范式进行补充。这些新视野、新方法与新理论，为清史研究带来活力。⑦ 经济史领域，林展提出以生产力—风险应对力作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解释框架，以期获得更为全面的对清代经济的理解，并对诸如大分流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讨论。⑧

可以说，本年度，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已初显趋势，在理论与实证、史料与观点上都有平稳的推进，未来如何在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基础上形成本土的清史研究学术话语体系，使清史研究历久弥新，仍需要学者们持之以恒地努力。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的指导。）

---

①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 年第 1 期；强光美：《合璧书写的演变与清朝的国家认同》，《历史档案》2022 年第 3 期。

② 张泰苏：《从“唐宋变革”到“大分流”：一种假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③ 李怀印：《晚清国家转型的路径与成败——以“三重均衡态”分析为中心》，《文史哲》2022 年第 3 期。

④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⑤ 马敏：《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以“近代”“近世”等概念为论述中心》；欧阳哲生：《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前瞻》；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三大体系”建设刍议》；金民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倪玉平：《“三大体系”建设与近代经济史研究》。均载于《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⑥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左玉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郑大华：《加快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的新思考》；崔志海：《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均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⑦ 王利华：《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梅雪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增添环境史范式》；姜涛：《晚清的人地关系》；朱浒：《近代中国的灾荒与社会变局》；马俊亚：《近代淮地环境灾难与生态修复》；王建革：《河流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与长三角近代文明的成长》。均载于《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⑧ 林展：《风险应对力——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